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建构

◇王培洲 唐爱军

一、为何建构：制度话语的新时代意义

(一)建构制度话语是在新时代讲明中国道路发展中“两个奇迹”的应然要求

制度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取决于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转变,意味着中国道路要实现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发展,这种方位与目标的双重转变本质地要求制度话语不仅要“从经济增长”层面阐释中国奇迹,还要能更系统、更深入、更真实、更立体地从“中国之治”层面讲明中国道路科学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讲明“两个奇迹”是新时代赋予制度话语的新任务,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面对时代之问不断回答的新内容。因此,透过经济绩效从更大的视角看,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事实上是在“发展事实”的基础上更深入地回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换句话说,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等话语共识下,新时代的制度话语重在从制度和治理的内在机理上阐释中国道路“为什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中国的事情的关键为什么在党”。

(二)建构制度话语是在新时代全球化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方式

用发展话语描述近代中国的复兴之路,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相对应的是如何“解决挨打、解决挨饿、解决挨骂”的问题。显然,在新时代全球化语境下“挨打”和“挨饿”问题已经解决,强起来的中国必须解决“挨骂”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解决“挨骂”问题不能仅仅用经济绩效和发展事实进行话语上的“辩护”,而是要通过凸显制度优势的“制度—治理”话语来有效说明中国过去做得对的事、正在做的事以及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能够做的事。“中国威胁论”出场和升级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

因此,解决中国道路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话语赤字”和“概念短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需要系统地、准确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践行中国道路过程中呈现出的制度魅力与制度优势,包括在此制度逻辑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正和博弈的决心与能力。同时也要承认,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意味着想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主动进入(中西)比较视域。在我们和“他者”的比较下,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其中的“理”在于阐释好发展事实背后的制度逻辑。

进而言之,制度话语为讲好中国道路发展的事实和实践提供了可证实的依据。以制度话语为基础阐释中国道路,便能清晰地表明中国发展的“道”与“路”不是野蛮生长,而是有为、有效、有序的现代化治理过程。这又进一步用制度实践与治理方式凸显出中国梦(和平发展而非谋求霸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社会主义特征又蕴含现代化过程中人类追求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等价值性话语的深刻内涵。

二、内容聚焦：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

(一)凸显中国道路的主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发

展的有效实践,中国道路的方向取决于中国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就制度而言,正是由于中国道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本质性规定,中国道路才走出一条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与中国自身的历史、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现代化新路,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进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深刻表征着中国道路的主体性,制度话语内容的建构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基础,不断提升中国道路在价值上的“能见度”与“分辨率”。

1.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要从根本领导制度层面讲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所表征的主体性,首先体现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其次体现为集中性;此外,还体现为治理中的“可连续性”。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要从根本制度层面讲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就主体性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表征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是被动地反映人民利益,而是能够自觉主动地整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激发人民的创造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要从根本文化制度层面讲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道路的主导意识形态,其主体性既表现在对资本逻辑的驾驭、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又表现在以中国道路具体实践和中国社会具体条件为语境,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为改造世界进行的不懈努力。

(二)阐明中国之治的有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执行力集中体现在“中国之治”中。有效的制度催生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中国之治的实践效果又为中国道路提供着有效的话语供给。制度话语有效的一个着力点就是在治理层面阐释清楚为何能形成“一盘棋”,如何调动各方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

1.目标明确。中国道路下的中国之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中国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党和国家对中国道路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目标有着清晰准确

的判断,并把“发展目标”转化为党、国家与人民的“奋斗目标”。

2.组织有力。在明确的目标下形成统一的治理逻辑需要高效的组织能力。一是就政权组织体系而言,以政策过程为例,组织能力表现在国家的重大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府具体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的“中央政策—地方政策过程”,这保证了国家层面推行的政策能够得到最快速、最高效的执行。二是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而言,从党的中央组织到地方组织再到基层组织,是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覆盖在国家政治系统及基层领域之中,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党的组织力量。

3.注重整体。中国之治的有效性还体现于重视制度与政策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与静止的“非此即彼”的形式思维相比,辩证思维具有动态的“亦此亦彼”的特点,系统性和整体性更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中辩证思维的主要体现。事实上,在新时代的政治话语中,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强调的“一体”与“全面”,也能够明确地看出在顶层设计中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强调。

(三)强调现代化治理的人民性

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道路在现代化治理中的鲜明特质。改革开放以来治理绩效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效满足了群众需求。进而言之,“中国现代性”背后凸显出深刻的人民性,人民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治理的一大逻辑是人民至上。

1.服务人民的广泛性和真实性。与西方现代性相比,中国现代化治理道路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服务人民的广泛性和真实性。简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人民民主所彰显的人民性,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也绝非仅仅是为纳税人服务,而是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中国道路始终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真正所指。因此,服务人民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凸显出中国之治的本质特征,凸显出中国道路的巨大优势所在。

2.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共建共治共享。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民主体性在于能挖掘、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人民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进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从偏重管控的“社会管理”向主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的话语转型,体现出在新时代语境下实现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政治逻辑。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框架中,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治理是其中的核心要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方式,使制度中的人民性贯穿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之中。

3.对人民呼声的“强回应”。在中国道路下的现代化治理逻辑中,人民呼声成为最大的“问题意识”,“民声”成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原初动力,同时又是改革实践的落脚点和检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治理方式上“强回应”的一个显著体现是“地方经验—全国推广”。地方尤其是基层往往最先听到群众呼声,在“中央—地方”的关系中,地方解决本地群众问题的典型经验往往得以在全国推广。对人民呼声的“强回应”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之中。从党群关系强调的“血肉联系”,到干群关系中将“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干部优劣的标准,内在地要求党员干部要把民心视为最大的政治。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群众路线不仅是作风和价值观,而且是对干部工作方法和能力的现实要求。

三、话语赋权:使制度话语成为话语权

(一)摆事实与讲道理:把中国道路的发展事实转化为制度的话语优势

必须承认的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是由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军事等构成的硬实力。因此,在“话语—权力”逻辑下要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成为话语权,一是要明确政治话语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绩效,讲明发展事实;二是要在发展事实面前解释好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对中国道路而言,就是要阐释清楚中国制度是如何在超大型社会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谋划发展的。简言

之,前者属于“摆事实”,后者则需要“讲道理”,要想为制度话语赋权,显然后者的难度要大于前者。

事实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事实已经被西方一厢情愿地用“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话语进行概括与表达,此类话语的“所指”显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毫无疑问,中国道路的制度话语作为软实力,自身可凭借发展中硬实力的积累而不断得到提升,在中国显著的发展绩效之中,强大的国家和政府、有为的政党以及有效的治理可以得到充分的彰显。但问题在于仅仅依靠发展事实的证明,一旦自身发展放缓抑或与外部产生摩擦,即当发展事实遭遇阻碍时,外部相应的话语冲击就会相应而生,“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不断粉墨登场,甚至通过所谓的“普世价值论”“锐实力论”明里暗里否定中国道路的制度与治理。

然而,制度话语要想成为话语权,仅仅讲好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事实显然不够,因此,要想从价值理性层面说明中国道路展开过程中的深层逻辑,就需要讲出中国奇迹背后所蕴含的制度机理,从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维度中凸显中国现代化治理的特点和方式。因此,要通过制度为事实赋能,把事实层面上的“是什么”进一步推进到制度和价值层面上的“为什么”,以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价值鲜明、支撑有力、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二)内外兼修:制度话语理论建构的两个着力点

就话语的功能发挥而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转化为话语权,对内要发挥话语凝聚的作用来统一思想、团结人心;对外要发挥话语引领的作用以巩固和扩展意识形态阵地,使话语发挥软实力功效。因此,制度话语要想有效发挥这两方面的作用,在理论建构上就要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即在中国道路自身及“中国道路—世界历史”两个维度的制度话语建构中做到“内外兼修”。

1.就中国道路自身来说,要将制度话语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有效支撑。制度是一个国家和政党的意识形态表征,制度话语显然应该与意识形态的目标、价值高度一致。显然,在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路向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制度“话语赋权”的着力点,而凝聚力和引领力是制度话语权力所指的关键,意味着要将制度话语的解释力转换为群众的政治认同感,防止出现“塔西佗陷阱”下的权力实践与群众评价的二律背反。因此,制度话语要通过根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基本制度的阐释,讲明中国道路是如何以有效政治推动而得以有效发展。制度话语的建构要在中国之治何以形成和实现的基础上,使制度话语具备动员、团结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最大限度地促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需要指出,以话语权为目的建构制度话语,不仅需要制度话语随着制度发展不断“体系化”、不断有新的增量并释放解释力,话语权关涉的政治认同的重要一环是传播。如果说制度话语内容的体系化建构在于增加话语解释力,那么传播力则关乎话语是否具有足够的“感染力”,因此,要形成与制度话语解释力相匹配的传播力,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显然,新时代的传播形态、传播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制度话语传播的“时度效”尤其重要,想要发挥制度话语的有效性,就要在传播过程中注意“时”和“度”。制度话语的传播要注重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话语传播的场域、时间阶段不同,话语的输入就需要作出相应调适以增强针对性和感染力。例如当今互联网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制度话语在互联网场域的传播与传统媒体大不相同,如何整合具有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关注细节、关注小事、碎片化)特征的网络话语,将传统制度话语的宏大叙事有效转化为微观叙事是当前制度话语在互联网传播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2.就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而言,制度话语转变为话语权意味着要能有效解决中国和西方观念领域存在的冲突。在中国道路与世界发展构成的

命运共同体之中,尤其是在中国之治越来越融入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解决发展的主动性与话语被动之间的矛盾。观念的冲突往往是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科技摩擦背后的深层原因,制度话语作为中国道路意识形态的有效支撑,必须在全球化语境下争取议题设置的主动权、阐释的主动权等。这种主动权意味着要从“话语辩护”阶段顺利过渡到“主动伸张”“话语引领”阶段,将制度话语作为全球化语境中意识形态话语的最大增量。当然,突出中国道路的制度自信,在制度话语中彰显主体性、破除西方制度话语的迷思,需要更加自信地在比较维度中阐释主张。因此,必须解决好当前观念领域存在的冲突,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的冲突、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中国梦与美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等等。在对中国发展事实和制度话语的有效阐释中,使中国道路得以穿透观念的迷雾在世界上获得制度话语权和体现制度优越性。

同样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道路的制度话语也要注重传播力。这意味着在阐释中国道路特殊性的同时也要兼顾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既要突出个性也要强调共性,使话语能够融通中外,以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效。在制度话语的传播上,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把“说理”和“陈情”结合起来,针对国外受众的习惯和特点,把中国道路下的经济发展、美好生活、厚重文化、美丽中国更立体、更生动地呈现在全球化语境之中,使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获得更多认同,在话语有效传播的不断积累下为话语赋权,厚植话语软实力。

作者简介:王培洲,河南濮阳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